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次版

出版：十月出版社
九龍大南街321-323號4樓A座
3·862780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18樓A2

定價：港幣三十元

出 版 說 明

編入本卷的文章或訪問記，是著者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間所作的論述中國問題的部份。

我們特地編入《當權的中國共產黨》（彭述之選集英文本）一書的序言作為代序，是由於它對著者的有關論述作了扼要的介紹和闡釋，會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此外，收入了陳碧蘭關於《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的訪問記，作為附錄，以便提供讀者對這問題更多的參攷。

本卷的文章，屬於著者以中文寫成的原著，有《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以及《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兩文的絕大部份。其餘都是從英文本譯出的，中譯文大都未經著者仔細過目。

我們期望讀者對譯文等提供意見及指正，以便同一些技術上錯漏，在再版時改正。

本卷之先於其它三卷出版，是因為計劃編入第一、二卷內的一些著作，還需要多方設法去收集；但我們相信這將不會拖延得很久。

彭述之選集

第三卷

出 版 說 明

編入本卷的文章或訪問記，是著者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間所作的論述中國問題的部份。

我們特地編入《當權的中國共產黨》（彭述之選集英文本）一書的序言作為代序，是由於它對著者的有關論述作了扼要的介紹和闡釋，會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此外，收入了陳碧蘭關於《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的訪問記，作為附錄，以便提供讀者對這問題更多的參攷。

本卷的文章，屬於著者以中文寫成的原著，有《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以及《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兩文的絕大部份。其餘都是從英文本譯出的，中譯文大都未經著者仔細過目。

我們期望讀者對譯文等提供意見及指正，以便同一些技術上錯漏，在再版時改正。

本卷之先於其它三卷出版，是因為計劃編入第一、二卷內的一些著作，還需要多方設法去收集；但我們相信這將不會拖延得很久。

目 錄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〇年)

《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英文本出版者導言	1—6
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7—30
不斷革命論與俄國革命	8
不斷革命論與階段革命論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的又一次考驗	14
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第三次革命中的曲折反映	2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新經驗	26
結論	30
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31—93
中共對蔣介石國民黨勝利的諸原因	32
中共奪取政權是否由於群衆壓力並違反了克里姆林宮的目的？	42
中共的勝利是否中國第三次革命的開始？	54
中共及其政權的階級性	65
中共政權措施的演進	72
中國的前途	79
我們的基本態度和方針	82

關於「中國局勢報告」的幾點補充和修正

(一九五二年五月)	85 - 93
關於中共的性質問題	85
關於新政權的性質問題	92

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日)	94 - 101
為什麼要保持秘密？	94
毛澤東的政策	96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表現	97
斯大林的誣騙制度	99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	100

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	102 - 117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原因	102
毛澤東政權的構成因素及其性質	107
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就及其隱藏的危機	110
經濟建設及其矛盾	113
新政權的對外政策	115
中國的前途	117

對擁護人民公社各種意見的批評與我們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118 - 177
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與農民的自願原則	119
所謂「農業大增產」和「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	132
公社是「自願的農民合作」並「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命令管理的」嗎？	143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還是中共榨取農民的 有力工具？	154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再說幾句	165
我們對公社的態度	169
附記	172
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 還是民主改良？（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	178
中共的性質——它不再是斯大林主義的政黨了嗎？	179
中共政權與蘇聯斯大林政權的對照	187
特權階層的形成、發展及其特權享受	191
關於「無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之證據」	201
全國人大選舉和全俄蘇維埃大會選舉相類似嗎？	204
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和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	208
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	218
史和梁往那裏走？	223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	229-240
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241-253
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公開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254-266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和分歧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	267-286

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287-295
林彪的倒台(一九七二年一月)………	296-300
論「批林批孔」運動(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301-321
天安門示威的意義(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322-330
毛嫡派倒台的背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331-341
毛澤東政治生涯的評價(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342-379
中國今日的異議運動(一九八〇年六月)………	380-395

附 錄：

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與「文化大革命」……陳碧蘭	396-409
-----------------------	---------

《當權的中國共產黨》英文本出版者導言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如下兩個世界制度鬥爭的焦點：一個是沒落中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另一個是上升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以產業工人階級為旗手。除蘇聯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這樣由於這兩種社會力量衝突而導致如此龐大、複雜的戰鬥，和如此激烈的翻天覆地。

在這個世紀，中國經歷了三個偉大的革命。在一九一一年，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建立了共和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動搖，這次革命未能達到主要目的：脫離外國帝國主義控制而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結束農村的半封建關係。相反地，共和國崩裂為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軍閥割據局面。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較為幼小的城市工人階級成功地引發了城鄉貧民的一次大規模起義，這次革命驟起，指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統一分裂的國家的前途，就如十年前俄國工人所做的那樣。但這個走向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難得機會，却由於當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被日益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國際領導強迫實行階級合作路線，將力量從屬於國民黨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因而被叛賣、被擊敗。

最後，在抗日戰爭中和戰後的外國侵略、農民起義的壓力下，毛澤東領導的斯大林化共產黨，發覺日益難以實行與蔣介石建立穩定聯盟的前景。無論共產黨的政綱如何機會主義，或其領導

如何願意達致妥協，國民黨却非要殲滅共產黨就不罷休。農民紅軍在此困境，只得戰鬥，並奪取了政權，開啟了全球最大的國家走向革命社會變革的大門。

可是，即使是這樣偉大的革命，雖然取得了無可爭議的成果——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並摧毀資本家和地主的權力，但却未導致中國工人階級取得社會的領導地位。正如毛澤東七六年逝世後所披露的資料——多年的鎮壓性警察統治和嚴重的經濟挫敗的倒退——所證實，在今日中國仍未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仍未民主化。

彭述之親身經歷了這些激盪的事變，而且在大部份時間不是作為旁觀者，而是作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政治領袖和戰略家。他的生命緊密地連繫於中國工人階級，在差不多六十年來，他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不屈的代言人。他個人的政治生涯在本書開頭的傳記性文章，由陳碧蘭生動地描述了，陳碧蘭是彭述之一生伴侶，她本人也是傑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

彭述之是中國最早一批參加共產主義運動者之一，不久就成為一位中央領導人。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湖南省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二〇年八月加入由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協助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未成立。從一九二一到二四年，彭氏在莫斯科「共產主義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是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的代表之一。

在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次黨大會上，彭述之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局五名委員之一，被任為中央宣傳部主任，又是黨機關報《嚮導週報》和理論刊物《新青年》的主編。

* 編者按：陳碧蘭該文見本選集第一卷。

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內，彭述之成為反對斯大林及其中國代表所制訂的災難性路線的最大膽批評者。他與毛澤東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徹底支持中共加入蔣介石的國民黨的致命路線，這路線導致一九二七年春夏中共和工會被血洗。

早在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就堅持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進行一條一貫的反帝路線，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的領導。他也堅持認為，農民雖然已證實有能力參加反壓迫的爆炸性鬥爭，但農民本身作為一個階級太過分散，不能發揮全面社會結合和領導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爭取農民跟隨那牢牢扎根於城市無產階級的獨立革命工人政黨的領導。基於這些立場（它們與托洛茨基和蘇聯左派反對派的主要立場相一致，後者當時在中國仍未為人知曉），彭述之提出論爭，反對中共從屬於國民黨，一直為重建脫離中國資產階級控制的獨立共產黨而鬥爭。

彭述之的政治戰鬥並不成功。共產國際機器的壓倒性勢力施加在中共之上。所有軟弱的或機會主義的黨領袖都附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結果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工人被他們誤信為同盟者的蔣介石所殘殺。之後是七月武漢相類似的大屠殺，主持者是汪精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在蔣介石與中共破裂後，汪精衛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在這些事變發展的過程中，彭述之說服了陳獨秀——中共總書記和最有名的黨創立人。在一九二九年，彭述之、陳獨秀及其支持者被逐出黨，因為他們支持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政策提出的革命性批評。這就標誌了中國的獨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開始。陳碧蘭的傳記式描述，是現有英文著作中最可靠的描述，敘述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此後的革命鬥爭的艱難歲月及如何受到國民黨和斯大林主義者的政治及肉體鎮壓。彭述之本人從一九三二到三七年被

囚獄中五年，同囚者有陳獨秀及其他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負責人；他們在國民黨法庭的審訊中曾轟動一時。

彭述之今天是仍然生存的幾個參加者之一，他們與列寧、托洛茨基時代處於革命中的共產國際領導有關聯。一九四八年，他受斯大林主義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此後，他和陳碧蘭一直將精力放在發展第四國際的工作上面；第四國際是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他們今天同是第四國際最受尊敬的領袖之一。他們留在中國的同志所遭遇的命運，是每一個斯大林主義政權對工人階級利益忠實維護者所預定的：他們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和五三年一月的全國性大逮捕中失蹤了，從此被囚在中共的監獄內；堅持不屈地被囚二十七年而仍活下來的幾十人，在七九年夏天被釋放。

本選集所收的文章、訪問記和政治文件，是一位積極的革命者的著作。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詳細分析了一九四九年掌權的斯大林主義政制的社會性質，它們原先不是為一般讀者，而是為第四國際的幹部研討而作的，這些文章的形式，是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一些個人或小組作辯論，後者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將中國資本主義政權及其後將資本主義財產關係被推翻所造成巨大成就，等同於毛澤東政權的領導。

第四國際內部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圍繞於：中共沉浸在這樣深遠的革命過程中，是否已令它從官僚階層特權的維護者，轉變成現在反映被壓迫者真正階級利益的黨。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遠方看中國革命，看到毛澤東似乎是與斯大林主義斷然決裂才能奪取到政權。這個評價令他們視毛政權正朝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方向走，因而他們抱有一廂情願的期望，希望中共將來會幫助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

正如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中所指出，上述整個論據的前提是錯誤的。毛澤東一開始是沒有以奪權為目標的。毛澤東及他的黨發覺被客觀形勢迫着走上了這條道路，於是就尋求一個拖長的時間，運用他們的權力來維持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關係而不是消滅它。（在一九五一年當彭述之作這個報告時，毛澤東仍未取消他對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支持；這個決定性行動在兩年後才作出，當時是在韓戰後期親資本主義勢力對經濟的破壞的壓力下做出這個行動的。）

最後，毛澤東實行的措施，比他們預算或主張的要來得急激。這些改變合起來，等於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工人國家。但它不是像俄國革命最初幾年由蘇維埃扮演決定性角色那樣的，由工人民主機構控制的工人國家。中國工人國家一開始就遭受中共最高指揮的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中共利用它對國家機器的控制，鞏固了在蘇聯已滋生了的那類寄生性特權官僚階層。彭述之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第三次革命這個深刻的矛盾。有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將毛澤東領導層與革命成果等同起來，從這種錯誤認識導致出傾向於毛政權或為它辯護；但彭述之與他們不同，他一貫地將他對國有化計劃經濟所造成的革命進步的不懈支持，同壟斷了政治權力的獨裁政權區別開。

不能作出這個區別，就只會導致政治混亂和放棄革命前景。這是史渥培 SWABECK 的可悲命運；他在五〇年代後期與彭述之就北京政府在「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進行尖銳的論爭。史渥培在美國共產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有一個長期和可敬的階級鬥爭戰士的經歷，但他不能掌握中國斯大林主義取得政權的原因，他相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組織，代表了人民民主的興起。這就導致他在一九六七年根本離開托

洛茨基主義，雖然他是美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在一九二八年建立的其中一名創始人，也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長期的領導者。

選集一些最吸引人的部份，是彭述之在所接受的許多訪問中對毛最後十年的統治的評價。這些訪問文章以豐富的資料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落，中共黨內部由於毛澤東個人崇拜日益牢固地樹立而進行的連續清洗浪潮（對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等），以及最後是毛本人的親信在他死後被推翻。彭述之表現了他的不同凡響的洞察力，其基礎是他曾在中國生活了超過五十年，他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和他對許多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廣泛的個人認識。

一九八〇年

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

現在我們所面對着的正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不斷興起，它們動搖了整個世界帝國主義的統治。但另方面，我們又看到：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正缺乏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缺乏一條正確的革命路線，以致革命的領導權都落在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政黨手裏，因而在這些已發生或正在發生革命運動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徹底解決了民族民主的任務—推翻帝國主義羈絆的民族獨立與消滅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革命不是停留在半途上，便是陷於僵持的狀態中。為要打開僵局，替革命開闢走向徹底勝利的道路，必須給這些國家的革命指出一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戰略方針，以便根據這個方針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此外的道路是沒有。

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提供了正確的戰略方針的便是托洛茨基。他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所提出的不斷革命的思想概念加以發揮，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首先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受到考驗。隨後，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一—二七年）中，從反面，從革命的慘敗中獲得了證明。當我們今天紀念托洛茨基—與列寧攜手領導十月革命勝利的領袖—被斯大林謀殺的二十周年時，將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命運有決定關係的不斷革命論提出於一切革命者之前，

* 英文本會刊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的《國際社會主義評論》。